

导 言

自 7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中国在 20 世纪后期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在朝着什么方向行进？中国社会将会变成怎样的形态？关系到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演变将会提供怎样的启示？在“冷战”期间长期对峙的两种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哪一种将赢得胜利？或两者都仅仅代表了某种局部性。在“名”与“实”的客观分析中是否可以揭示出二者之间的某些共性或内在的联系？中国与外国的学者与政治家们，无不对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重大社会变革表示极大的关注。

要想深入系统地了解中国社会当前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切实可靠的方法还是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就像当年毛泽东为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而在农村开展的深入调查一样，摈弃一切成见，通过解剖麻雀，抓住当前社会变迁的主题和动力，从而做出客观和深刻的、能够揭示社会发展大走向的分析。

自中国社会学创立以来，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就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把人类学的田野社区调查作为了解和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具有一定社会科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通常会借用或参考国外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是在欧美创立后引进来的，因此难免在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界定、思维和推理方式

等方面带着欧洲社会及其文化的烙印。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否适用于自身具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国社会，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产生于一些既定文化的人类知识在应用于其他文化的社会时，会出现“跨文化沟通”的难题，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人类学作为一门天生就是研究“异文化”的学科，十分强调在对待和研究“异文化”时所持有的“跨文化理解”这样的态度和视角。重视从自身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素材当中，根据当地人的思路去描述与“重构”当地社区与文化，从这一过程中来客观地理解当地社区与文化。这种研究态度与方法，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的国土和国情中验证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中来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有助于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能够说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科学基础的建构，有必要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个案进行社区调查的方法。

在开展社会调查之前，无疑首先需要研究方案和方法进行科学的设计。而为了要系统和有计划地调查剖析中国社会变迁，首先需要把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社会结构组织界定出来，作为社区调查的对象。从表现中国社会基本社会组织的个案类型来看，大致可以开列出以下几类可作为调查单位的社区：(1)农村：平原农业社区、山地农林业社区、草原牧业社区、海岛渔村、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农牧业社区等；(2)乡镇：乡镇机构、乡镇社区等；(3)城市：城市街区、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经济开发区、少数民族人口聚居街区、外来人口聚居社区等；(4)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小型企业、城市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个体专业户等；(5)特殊的社会组织：军队、监狱、大型寺庙、政治团体等等。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和深入地调查这几类有典型性的社区，并通过对一组个案的调查来了解这些基本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组织方式、运行机制，它们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

对整体社会运转的作用等等方面，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认识就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确定了调查对象之后，还需要明确每项调查研究的具体目的和重点专题，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调查地点，并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特点来设计具体的调查方法和相应的分析手段。

二

自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¹成立之日起，在费孝通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即开始有意识地对各类中国社会基层组织进行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正是这些社会基层社区的个案调查，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供我们剖析和分析的“麻雀”。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城市与乡村相对分离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与外界社会接触较多，在经济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对外经济交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影响的大小城市；另一方面，是相对保留了较多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经济形式、文化观念特点，以及相对封闭保守的广大农村。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80%²，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这表明了农村社会与农民在中国社会中所占据的关键位置。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无不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所以中国社会学自本世纪初期创建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各地农村社会的调查活动。人们熟知的《江村经济》(费孝通,1986a)³就是30年代社会学农村调查的一部代表作。社会学在建国后不久曾一度中断了二十余年，80年代初期社会学的重建，与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在时间上大致是同步的，所以调查与研究中国农村在这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变迁，应当说是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的责任。因此，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在建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调查的重点也依然是农村，其中包括了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的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这个时期陆续组织的村落个案研究包括：《桃源农民生活与社区发展：湖南省桃源县农村社区调查》(李慷,1989年博士论文)《石村变迁》(惠海鸣,1990年博士论文)《文化的适应和变迁 羌村社区调查研究》(徐平,1990年博士论文)《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府村调查》(马戎、潘乃谷,1993)、《责任制后北王村基层组织的变迁》(张弘平,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农民两栖化与城镇化 燕村实地研究》(王勇,1995年硕士学位论文)《体制变革、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一个草原牧业社区的历史变迁》(马戎,1996)、《拉热村社区调查与研究》(于长江,1996)、《社区的历程 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王铭铭,1997)等等。所调查的这些农村社区包括华北农业地区、内蒙古草原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大都市郊区、华南农业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农业地区、沿海农业地区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村落社会的生动画面。对于各种类型村落的研究，我们在今后仍将有计划地进行。

我国农村的体制改革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发展之后，必然会冲破村落的地理范围而进入城镇，家庭联产责任制从原来的公社体制下释放出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开始进入大小城镇，推动了乡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产品集贸市场的恢复也推动了小城镇的繁荣。所以在 80 年代开始不久，费孝通教授及时地把“小城镇发展”问题提上了政府关于城市化道路和劳动力安置这些重大决策的日程表，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学界关于小城镇的调查研究(费孝通,1986b)。他亲自组织了 1985 年在江苏省 7 县的 190 个小城镇调查(参见《小城镇区域分析》，1987)。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围绕着小城镇发展问题在不同地区也开展了一系列个案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乡镇人口迁移、乡镇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等领域。

在 90 年代初期，在我国的乡镇社会中最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就

是新兴起的乡镇企业，它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和基层“放权”（使乡镇、村有了经营管理企业的合法权力）、家庭承包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并产生了地区性就业压力）、农民和基层社区通过经营自主有了一些积累（拥有了开办企业的资金）、统购统销和产品专营体制的逐步取消（销售市场的开放）等一系列因素综合在一起的合力而促发的。由于各地受这些因素作用的强弱程度不同，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和特点（如所有制结构）也不尽相同，调查研究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及时地分析“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这一新生事物应当是当时农村研究的核心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在 1992 至 1993 年期间 我所与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合作，在山东威海地区和江苏吴江县组织了对于乡镇企业的系列个案研究，在两地共调查了 30 个乡镇企业，整理和编辑的调查报告集分别在北京（《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马戎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香港《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调查》，马戎等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和新加坡 *China's Rural Entrepreneurs*, John Wong, Rong Ma, Mu Yang, eds,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年版 三地以中英文出版。

与此同时，我所针对小城镇的其他方面，如农民从村落到小城镇的迁移活动、农村农牧业经济与小城镇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县镇与其他建制镇的结构比较等，分别在不同地区开展了一些专题性的个案调查，完成了一批调查报告，如《我国小城镇的结构特征与进镇人口迁移》（翁牛特旗六镇调查，马戎，1995）、《单一产业与牧民生活：关于差岗镇的个案分析》（傅喜国，1995）。关于各地乡镇企业发展特点与趋势的研究同时也在继续之中，如根据在内蒙古赤峰的实地调查完成的报告《从松山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特点看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潘乃谷，1996；1997）。

但是，在上述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中我们逐步感到，小城镇的经济活动和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乡镇政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多数地区，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产值比例来说，乡镇企业中的主体还是乡镇政府开办的企业，其次是村办企业，乡镇政府在小城镇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所以在乡镇企业研究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认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应当及时地转移到对乡镇组织方面的调查，十分有必要选择一批有代表性的乡镇，以其为对象开展更为系统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是以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他各类组织作为进一步调查的重点。

三

从社会管理体制来说，乡镇这一级即相当于我国农村实行体制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是我国政府机构的最低一层，其直接的上级是县政府，乡镇的下面一层是“行政村”，也就是过去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所以，过去的“公社”和现在的乡镇，是我国社会体制中城乡两个部分的中介层次，是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键环节。

根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在业“镇人口”仅占全国在业总人口的 7%，但是以在业人口的行业划分来看，全国行政部门人员的 32.6%，运输与通讯业人员的 21.7%，商业人员的 28.6%，服务业人员的 18.0%，金融保险业人员的 34.7%，科教文卫人员的 20.0% 都集中在“镇人口”中（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3:474）。以上这些行业人员在市、镇、乡村三部分人口分布结构中如此集中于镇这一级，充分地说明镇在城乡沟通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下属的行政、经济管理、贸易、金融、税收、司法、公安、教育、邮电、医疗系统的最底层的机构，就设在乡镇一级，它们或者是这些政府机构的基层组织，或者是其派出机构，乡镇这一级的机构是位于城乡结合中介层次的一套结构完整、功能齐全政府机

器。1996 年底，我国共有 2,142 个县级单位（包括县级市）和 45,484 个乡镇，平均每个县管辖 21 个乡镇。同时乡村人口共 91,941 万人，平均每个县管辖 43 万人，每个乡镇管辖 2 万人（国家统计局，1997:366）。国家和政府正是通过设在乡镇一级的这些机构与组织对占总人口 70%—80% 的 9 亿农民进行日常的管理与交流。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农村改革的后果和其对城市的影响可以说首先是集中地反映在乡镇这一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也是我们在开始研究乡镇时首先把注意力放到乡镇企业调查方面的原因⁴。

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从原来的“政社合一”和经济上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离”的乡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行政体制和经济上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承包制，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人们对农村体制变迁的关注点通常集中在基层的村和户，而对于在这场重大变革中乡镇（即原来的公社这一级的体制与组织变迁则注意不够，对乡镇公社）体制与所属组织变迁的研究也相对比较薄弱⁵。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重要的一步，是从国有经济占绝大多数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外资的引进无疑是城市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一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乡镇企业的示范绩效及其向城市的渗透。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国有企业在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可以借鉴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在我们向处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外企业学习的同时，向就在身旁、处于同一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之中的乡镇企业学习是更便利的。在那个时期研究乡镇企业除了帮助我们了解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前景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今后我国城市企业制度改革的前景。同样，调查研究乡镇政府如何

领导、管理乡镇企业，对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管理方法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也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当然，今天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已经又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需要我们及时进行跟踪调查与研究。

农村行政组织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对之实施领导、与之密切联系的乡镇行政组织从形式到运行办法的改变，其发展的方向应当是伴随着农业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农村管理从“行政命令”向“民主、法制加政策引导”的转变。具体的转变形态与内容，当然是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得知。我国城市组织的行政管理办法也需要改变，也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乡镇组织的深入调查研究，也有可能帮助我们思考我国城市管理制度改革的前景。

总而言之，乡镇是当前中国政府机构的最基层，乡镇各类机构是我国政府公务员工作的最基层的组织，乡镇是城市与农村的中介层，政府正是通过乡镇的各类组织来领导、引导、管理广大农村的各项活动和 9 亿农民。在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特点的社会，对二元之间的结合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当前分析和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同时，相比起来，乡镇组织比城市组织简单，又比农村组织复杂，有了过去开展农村社区调查的经验，对于乡镇组织的研究也比较容易把握。正是出于这些考虑，1995 年我们决定开展一项关于“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的研究。

四

在确定开展乡镇组织研究之后，我们反复讨论与思考几个问题。在基层社区调查中，研究者很容易被周围的那些新鲜生动同时又纷杂细碎的具体事件和案例所包围，见树木不见森林，见浪花不见海洋，并在对基层那些大量报表、文件和事件的讨论中迷失方

向。我们确定了研究乡镇组织之后，需要进一步明确：在乡镇这一级我们能够研究什么？哪些方面的专题最适合在乡镇这一级来研究？乡镇组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哪些关键的理论问题？为了努力去理解和回答这些理论问题，在调查活动中我们最需要关注和了解的是什么？

首先从“国家”—“民众”之间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从“人民公社”制度到目前体制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是政府权力的弱化，从直接管理和以行政命令为手段转变为间接监督和以市场调节为手段。也有人认为，新的体制体现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控制在农村的强化，并以乡镇一级政府机构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作为佐证。

“国家”—“民众”关系这一题目是西方社会学的传统专题，我们认为带着这个问题来进行中国的乡镇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需要说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我国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不妨增加一个层次，变为“国家”—“基层社区”—“民众”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几千年来我国以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村落组织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学者们经常提到的乡土社会的“绅权”和“长老统治”的基层社区（费孝通，1985:65—70）。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划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乡镇组织与村落的关系所体现的大致是“国家”与“基层社区”之间的关系。

当然，乡镇在成为一级财政之后，在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之后，也会出现某种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但这与县一级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意识有相近之处，作为国家任命和领取国家薪金的流动性公务员、乡镇干部和他们领导的乡镇机构，所代表的基本上仍然是“国家”。这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明显。而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乡镇一级各类企业的发展，乡镇干部或者是由企业家出任，或者与企业家有密切关系，从而表现出“国家公务员”和“社区精英”的两面性。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乡镇一级的研究来分析“国家”与“基

层社区（村）之间的关系 而对于“国家（通过基层社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可能最重要的研究层次是村落与农户。

政府机构是一个国家政权的骨架。近年来，我国的国家机构与公务员总数迅速扩大，这里既有“文化大革命”之后“落实政策”时安置干部的因素，也有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机构分工细化的影响。1996年底我国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人数达到3,673万人，比1978年增加82.3%⁶，政府机构的改革和“精兵简政”恐怕是势在必行的。由于基层行政组织都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条件管理”的体制而设置的，所以行政机构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推行。但是我们可以从基层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如对乡镇一级的各种机构的功能进行分析，哪些机构在体制改革中衰落，目前仅是维持并很快会被撤销甩出的；哪些机构应当转化成为社会化市场服务机构，而不应继续作为政府部门来履行职能的；这些机构的哪些工作量（会议、文件、报表、检查等）是本系统甚至本地本部门“自我创造”的，哪些是上级政府决策时真正需要的。对于几个镇政府和下属镇级组织的系统调查，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行政系统的体制改革，相信是会有所启发的。

一个体制、一个机构从理论上设计得再好，它的实际运作和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素质。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大致包括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业务能力、敬业精神、工作经验等，素质高的人员就会有高工作效率与好的业绩。有些机构或管理办法，有时不得不根据所能雇用的人员素质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或调整。个案调查的一个长处，就是可以接触到实际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乡镇组织的调查中，在了解其体制和运转规则的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在这些组织中负责和工作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解他们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与行为方式，以及使他们得以进入这些机构或升迁的机制。我们可以设想今后国家机构设置的理想型是个什么样子，但更重要的，是要清楚今后在

这些政府机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将会是具有哪一种素质、通过哪一种渠道升上去的人。

根据以上的思考和课题组的多次讨论，我们逐步确定了在这次乡镇组织调查中的主要关注点：

(1)对乡镇一级的各类机构与组织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系统性的调查 包括上下级关系、机构建制、人员构成、工作职能、管理手段、经济来源、内部运行规则、对外互动机制等等 从而了解这些机构的现行状况与运行机制。

(2)我国基层组织在近几十年内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革，在调查乡镇组织现状时，需要关注这些机构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决定、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大环境与各种因素，不能割断历史过程和脱离社会大环境来研究现状与局部的变化。如农村供销社的产生是与 50 年代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同步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度是农村贸易活动的核心，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放开而陷入困境，脱离开整体社会的变化是无法说明供销社的命运的。

(3)在调查各个组织静态结构的同时，注意它们的内部与对外的动态运作。惟有通过具体事例的运作，才能真正理解其结构与执行功能的办法。写在规章制度中的条文，不一定就是实际运作中实施的办法；而且对于一个外来的研究者，只有通过了解具体事例的运作才能获得对于这些规章制度和文字材料的感性知识。

(4)关注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工作的人。不能只见体制不见人。同样的制度结构，同样的运行规则，如果执行的人员在基本素质、价值观念上有差异，这些机构的实际运行和产生效果可能也会不同。例如同样的厂房与机器设备，使用同样的原料，实行同样的管理规章，这个工厂是由训练有素的员工来操作，还是由其他工业化训练不足的员工来操作，产量、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可能会很不一样。所以需要注意各个机构人员的基本素质（受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项能力等）招收渠道 正式考试招工、私人推荐、部队复员、

上级选派、机构间调动等)工作业绩(工作成绩、奖励等)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民族、工作经历等等)应当说我国基层干部的素质是在不断提高,处在一个年轻化、知识化、晋升制度化的过程之中,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各地区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仍需要在实地调查中加以了解。

(5)在调查乡镇级组织的同时,兼顾县、村两级。我们在实地调查时,首先对县级组织机构、下属编制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倾听他们介绍县里的机构如何领导和管理乡镇级组织,从县级主管部门了解乡镇组织如何与县里发生关系。同时也去调查各乡镇下属的一至两个行政村的村领导机构(村委会、村党支部),了解村一级的组织和人员是如何与乡镇机构进行工作上的联络与沟通。分析县与镇这两级政府组织的异同,分析乡镇在与村落互动之中各自是如何代表政府意志与利益的。

(6)在描述乡镇组织机构现状的同时,注意分析各个组织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发展前景。在各地的访谈与座谈会中,这些多年在乡镇从事各项具体实际工作的干部,会从他们每天的工作体会中谈到他们对这些机构目前存在问题的看法与分析,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才是最终的目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不处在解决问题的位置上,但是对于问题的客观、深入、系统的分析无疑会有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思路。

以上六个方面,是我们在设计乡镇组织调查课题时提出的主要关注点。我们在各地的实地调查中,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特点,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专题。如河北省玉田县彩亭桥镇的调查就结合玉田县的特点,对于在当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民合作基金会进行了重点调查。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在保证主体调查内容的前提下,注意发掘与分析具有各地不同特色的新问题。

五

在课题设计的初期，为了对乡镇组织的实际情况取得一些感性认识，检查与修订课题的调查框架，课题组在 1995 年春季组织了在河北省玉田县彩亭桥镇的试调查。参加试调查活动的除了本所研究人员之外，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名研究人员⁷。在彩亭桥镇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重新修订了调查计划，并制定了调查地点的选点方案。

考虑到可供使用的人力、财力与时间，我们最后决定在全国选取 5 个非县镇之外的建制镇作为调查对象。在我国的正式统计中，县政府所在的地点，通常也是建制镇。但是从县城的人口规模、行政机构、管辖地域、经济规模等方面来看，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县城是处于乡镇以上一个层次的社区。在行政体制中，乡与建制镇大致处于同一个级别，但又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如：镇政府机构的规模大一些⁸，设有镇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城镇建设费”等等⁹。在研究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首先排除了县镇，然后又排除了乡政府所在地，最后确定的调查对象是非县镇的建制镇¹⁰。

经过多次分析讨论，我们考虑到全国地域分布、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类型代表性、当地政府支持程度等各种因素，最后决定在全国选择 5 个镇：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河北省玉田县彩亭桥镇、湖北省仙桃市毛嘴镇、浙江省玉环县陈屿镇、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这 5 个镇的基本情况参见表 1。

除了代表江浙海湾地区的浙江省陈屿镇之外，另外这 4 个镇在地理分布上从北到南一字排开，在资源条件、经济结构、管理体制等方面各有特点，代表着我国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建制镇。

表 1 被调查各镇及其所在省份的基本统计指标 (1995 年)

	总人口 (人)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均耕地 (亩)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按 1990 价格 *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内蒙古自治区	-	-	3.57	5058	1208
桥头镇	32573	320.4	4.30	5972	1330
河北省	-	-	1.51	7991	1669
彩亭桥镇	18000	26.4	1.66	11111	1720
湖北省	-	-	0.86	8820	1511
毛嘴镇	74369	115.0	1.02	5566	1809
浙江省	-	-	0.56	20791	2966
陈屿镇	37508	45.5	0.49	22492	4876
广东省	-	-	0.50	15988	2699
清溪镇	30285	143.0	0.70	11557	3180
全国	-	-	1.16	10790	157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6：44、70、356、404 以及各镇报告。

* 因一些镇没有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故采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

桥头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部翁牛特旗的南部，处于高寒地区，地广人稀，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虽然翁牛特旗是全国的贫困县，但桥头镇在该旗县属于自然条件和收入较好的镇，乡镇企业不太发达，大致可以代表我国中西部发展较慢地区的乡镇。

彩亭桥镇位于河北省唐山地区玉田县西部通向北京的公路两侧，地域开阔，交通发达，盛产蔬菜。从人均自然资源、地理生态条件、经济类型等方面看，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平原农业地区的乡镇。

毛嘴镇位于江汉平原，在清代曾属于湖区，经过多年的淤积和垦湖造田，现已变为以稻谷生产为主的农区，雨量充沛，人均收入高于湖北省农村平均水平，非农业人口占 10.1%，乡镇企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可以大致代表我国中部平原农业地区的乡镇。

清溪镇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南面，与深圳市相邻，过去只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深圳市经济的发展，清溪镇的

各项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是被调查的 5 个镇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一个。所以清溪镇可以代表南方临近“特区”并深受“特区”影响而在经济上崛起的新兴乡镇。

陈屿镇所在的玉环县是我国的 12 个海岛县之一，镇内有天然良港，渔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盛产水果，以私有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乡镇工业相对比较发达，实行的是镇政府与“开发区管委会”合一的组织体系，具有体制上的特点，可以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多种经营的乡镇的代表。

除了彩亭桥镇的试调查是在 1995 年春季进行的之外，其他 4 个镇的实地调查工作都是在 1996 年完成的。参加 1996 年调查工作的，均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的研究人员与博士研究生，各调查组的具体组成如下：

河北省玉田县彩亭桥镇调查组：马戎、刘世定、邱泽奇、王铭铭、柳可白、石秀印；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调查组：马戎、张敦福、蒋丽蕴；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调查组：刘世定、邱泽奇；

浙江省玉环县陈屿镇调查组：刘世定、邱泽奇、刘能；

湖北省仙桃市毛嘴镇调查组：刘世定、邱泽奇、刘能。

参加各个调查小组的人员在实地调查中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在对被调查乡镇的政府机构和其他各类组织的整体情况进行了解和分析之后，把这些组织分成几大类，然后调查人员进行分工，每人负责一个大类中各个机构与组织的调查访谈和资料搜集工作。为了了解县级、村级组织与乡镇级组织之间的关系，调查组特别安排了在县里和选定行政村的调查活动。在调查人员分头进行调查访谈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关键问题或新现象，调查组及时组织共同讨论并修订调查计划。最后，在大家对各自访谈笔记、所获各类资料进行编辑整理的基础上，由调查组的一名人员进行统稿。所以，无论是调查活动还是调查报告的写作，都应当视为调查组全

体成员共同的工作成果。

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组织的“中国乡镇组织变迁”课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各镇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论文。本书所包含的 5 篇调查报告，就是成果中的第一个部分。

作为社会基层社区所属组织的个案调查报告，我们希望能够：

(1) 具有系统性。这些组织与机构之间各个层次、各个系统界限分明 关系清晰“条条”与“块块”一目了然 使读者能够把握住乡镇组织的整体脉络。

(2) 凡是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尽可能吸收进调查报告，有些需要详细和完整地予以保留的，作为“附录”放在报告后面。在目前的中国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许多制度规章被迅速淘汰更新，记述这些制度规章与实际运作的原始资料很快就会变为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应当及时搜集与保存下来。我们的知识、阅历和研究能力都有限，保留下来这些原始资料，可以为其他研究者或后人提供研究素材。今后对于这些资料可以不断地进行开发与研究，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需要一代一代对于研究资料和知识的积累。

(3) 文字简练，数字准确，保持调查报告的特点。报告的主要内容为调查访谈中得到的基础数据、素材资料与访谈笔记，对于所发现和联想到的一些问题点到即止，在报告中不做更多的分析、比较与研究。在设计上把分析和研究作为课题组第二部分成果的内容。

读者们可以从这 5 篇调查报告中得到许多关于乡镇一级各类机构及其运行的详尽材料，为了用经验性素材来说明这些机构的运行过程和特点，报告中包括了一些我们认为有助于读者理解的典型事例，使得这些报告有骨架也有血肉。从名称上看似乎职能

简单的一些机构，在社会运转过程中实际上非常之复杂。对于我国农村、乡镇比较熟悉的或者是比较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些事例中“感觉到”这些活生生的人员和机构的运转。这 5 篇报告在内容的结构上虽然有着一致的要求，但每一篇也都有其特色和不同的重点。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课题成果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名为“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的专题论文集。我们在经过仔细选择后，大致确定了 10 个研究专题：

- (1) 中国乡镇组织机构和功能的历史变迁；
- (2) 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及其运作机制；
- (3) 乡镇级财政体系的结构与运转；
- (4) 乡镇政府直接、间接经营的经济活动和辖区内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
- (5) 乡镇级各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
- (6) 乡镇政府、乡镇属机构与县政府、县属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
- (7) 乡镇政府、乡镇属各机构与行政村组织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 (8) 乡镇组织与地方教育事业的管理；
- (9) 乡镇政府与地方法规（规定）的制定与执行；
- (10) 乡镇政府与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专题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乡镇组织的基本结构、主要功能与历史变迁。以课题组成员为主体，我们组织了一些研究人员围绕这些专题撰写论文。专题论文所使用的研究素材包括：(1) 5 镇调查报告；(2) 其他中外学者的研究报告和论文；(3) 政府部门的其他统计资料和政策文献；(4) 研究社会组织的相关学科的有关理论文献。这样，既以 5 镇调查为基础，在分析中对 5 镇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又在资料使用范围上不受这一课题调查